

“议论文章”与北宋时代精神 塑造及文学变革

张德建

【摘要】议论是人类思想、认识和情感的高级表达方式,在行为层面涉及个体精神气质、群体交往、学术研讨、理论表达、政治见解五个方面。北宋以来,“议论”一词开始大量出现,其概念亦不再单指论体,而已扩充为包括著述与文章在内的所有文字表达形式,“文章议论”“议论文章”的新学术概念于此产生、流行,并作为共有术语回应着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时代精神,在道德、政事、文学三位一体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粘合剂的作用。逐渐凝定为专门术语的“议论”一词,既是体验和介入现实世界的特定范畴和模式,又介入了文学活动。在文学变革中的议论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,表现出议论行为的普泛化、议论的实用化、表现的文学化三方面特征,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参与着塑造文学形态的过程。

【关键词】议论文章;政治文化;精神价值;学术建构;文学变革

【作者简介】张德建,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,发表过论文《明代隐逸思想的变迁》等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文学遗产》:中文版(京),2023.3.99~111

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叙事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,相比之下,学界对议论却少有关注。过去的文学研究多将议论视作一种内容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段^①,且多止步于陈述,很少进行学理论证。细究之下,议论有行为、修辞、文体、文类四个层面的含义。在行为层面,议论包括甚广,层次甚多,既有日常生活和群体交往中的议论,亦有技艺、宗教、文史、学术研讨层面上的议论,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政治层面的议论。在修辞层面,议论是人类思想、认识、情感的高级表达方式,普遍存在于言辞、文章之中^②,并随着人们的关注点从内容向表达的转移而具备日益突出价值^③。在文体和文类层面,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已将论体分为陈政、释经、辨史、论文四大类,议、说、传、注、赞、评、序、引八种;至南宋,在真德秀总分众体的辞命、诗歌、议论、叙事四个文类中,议论位居其一。在政治领域,议论发展成为政治文化中的主导趋向,并被塑造为一种时代精神。同时,“议论”的种种行为

和士人的精神追求引领了学术变化,“议论文章”成为联结不同学术的关键,重新建构了新的学术体系,并将这种变化固定下来。值得注意的是,北宋以来,除了专门的论体文之外,议论在各种文体中的成分都在增加,进而引领了文学变革。

本文将通过对议论行为及其功能的分疏,解读北宋政治文化中的“议论”如何塑造时代精神、重构学术体系,以及如何影响并促成了文学变革。

一、议论行为的分疏

中国古代对言说行为有清晰的界定,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可见“直言曰言,论难曰语”^④,即直言与论难是表达的两个层次,前者是直接的言语表达,后者是更高层次的研讨。至于议、论,则进入到最高的理论抽象层面,如杨倞注《荀子》“加义乎身行,著之言语”时称“以义著于言语,谓所论说皆明义也”^⑤,认为言语承载意义,论说乃对意义的阐释。实际上,荀子已经对议论行为提出了系统严密的理论主张,在《非相》

中对“类”“实”“博”“统”的论述既关注表述逻辑和表述方式,亦涉及语言和风格问题^⑥;对“论”“议”的界定更加全面,认为在“万物莫形而不见,莫见而不论,莫论而失位”^⑦的“大清明”境界中,万物皆可论。具体而言,从行为的功能和性质这一视角来看,议论行为又可以分为五个层面。

其一,议论是个体精神气质的外现。如《荀子》已将议论视作士人的基本素养,认为“法先王,顺礼义,党学者,然而不好言,不乐言,则必非诚士也。故君子之于言也,志好之,心安之,乐言之,故君子必辨”^⑧，“少不讽,壮不论议,虽可,未成也”^⑨,即志于言、乐于言都是士人的基本品质,倘若“不好言,不乐言”,“不讽”“不议论”则其人无方无定,不能称之为诚。日常生活中的议论行为亦可见其人之精神气质,如陈寿《三国志·华歆传》中写华歆为人端谨,持论平正。由其议论,亦可定人品之高下,如司马迁《汲黯列传》中所载,汲黯由张汤“文深小苛”^⑩之议论知其只可为刀笔吏,难以成为治天下之公卿。

其二,议论是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交往方式之一,会自然形成社会舆论。如王充《道虚篇》中记载,乡里的“议论”对求仙的卢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,为求世人认可而不得已作“夸诞之语”^⑪,可见社会舆论对个体言行的强大影响。与此同时,好议论的社会习尚还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。司马迁《货殖列传》中写道,临淄“其俗宽缓阔达,而足智,好议论,地重,难动摇,怯于众斗,勇于持刺,故多劫人者,大国之风也”^⑫,其“足智好议论”的风习与“勇于持刺”之间有着直接关联,因而传统社会对议论风尚常持警惕态度。

其三,议论是研究经义与学术研讨的重要方式。在好议论之性情驱使下,落笔成文也成为早期著述的重要产生方式。如范曄在《后汉书·王充传》中提到,“充好论说,始若诡异,终有理实。以为俗儒守文,多失其真,乃闭门潜思,绝庆吊之礼,户牖墙壁各置刀笔。著《论衡》八十五篇,二十余万言”^⑬;仲长

统《昌言》的成书亦缘于“论说古今世俗行事,发愤叹息,辄以为论”^⑭的行为。议论行为也构成了学术研讨中的重要交流方式,如常璩《华阳国志·后贤志》中所记,李宓所著《述理论》引来胡黑与皇甫士安等一时学者“议论往返,言经训诂”^⑮。再者,著述还是学术议论的最终呈现方式,故王充在《论衡·超奇》中写道,虽通人、文人鸿儒、博通能用之者的表达方式有别,但无不以“论说”为中心^⑯。

其四,议论行为在宋代之后上升成为特定的学术模式和类型。宋初以降,随着解经方式的变化,议论行为从一般意义上的著述论说演化为区隔不同学术的代名词,代表着一种学术模式和类型。朱熹将宋人解经的行为概括为“议论”,并将其源头追溯到欧阳修、刘敞、孙介,称“理义大本复明于世,固自周程,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。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,至永叔、原父、孙明复诸公,始自出议论”^⑰。此后学者亦以议论之学称宋学,如郝经《经史》说:“古不释经,亦三变而迄于今。训诂于汉,疏释于唐,议论于宋,三变而经之法尽矣。后世无以加也。”“训诂之学始于汉而备于唐,议论之学始于唐而备于宋。”^⑱以“训诂”“疏释”“议论”概括汉唐以来经学演变,无疑是十分精确的。杨慎《刘静修论学》亦云“六经自火于秦,传注于汉,疏释于唐,议论于宋,日起而日变,学者亦当知其先后”^⑲,直接以“议论”指称宋代经学研究。

其五,在政治生活中,议论既是表达见解的方式,亦是论争的工具;既与个人品格有关,亦具有群体和时代特征;既是一种言论,又具有实践的意向。《荀子》的“坐而言之,起而可设,张而可施行”^⑳,荀悦的“一夫窃议,语流天下”^㉑,韩愈的“清为公论重,宽得士心降”^㉒指出了议论作为执政方式、形成“公论”制约权力的功能,也提及公论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力。士大夫的清名为“公论”所重,是极高的荣誉,即使是皇帝也要遵从,如白居易在《论于頔所进歌舞人事宜状》中所写,“伏见陛下数月已来,分别邪正,所有制断,所有处置,无不合于公论”^㉓。也正因此,“公

论”还成为士大夫政治失意之下的一个精神支柱,如杜荀鹤在《送黄补南迁》一诗中感慨:“自古有迁客,何朝无直臣。喧然公论在,难滞楚南春。”^②对远谪的官员来说,除了用直臣自勉,来自“公论”的支持也是他们的希望。

在以上五个层面中,政治见解层面的议论行为与文学的关系十分紧密,并在宋代前后发生了一次较明显的变化。上古先王时代,政治开明,议论自由,可谓上自朝廷,下迄乡校林野,无不一议论,如常璩谈到,上古时“有志之士,犹敢议论于乡校之下,刍荛之人,加之谣诵于林野之中,管窥瞽言,君子有采。所以综核群善,休风惟照也”^③。至诸侯纷争时代,游说之士仍可上下其议论,司马迁写战国时齐宣王门下游说之士纷纭,“不治而议论,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”^④,便呈现了这种开放自由的场景。但这样的状态很快随着统治的需要而消失,士人不得不小心谨慎。韩非以结党营私定义议论^⑤的方式,更易为后世君主接受,以致不少士人都在忌惮议论背后的政治风险,如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中马援诫侄,称宁死不愿闻子孙有“好议论人长短”^⑥的行为。但在宋代,却再次出现推重议论之风,不仅表现在个人、群体的社会生活层面,亦表现在思想、政治、文化、文学层面。如唐庚所记:

苏黄门云:“人生逐日,胸次须出一好议论。若饱食暖衣,惟利欲是念,何以自别于禽兽?予归蜀,当杜门著书,不令废日,只效温公《通鉴》样,作议论商略古人,岁久成书,自足垂世也。”(唐庚《唐子西文录》,何文煊辑《历代诗话》,中华书局2004年版,上册,第446页)

在苏辙看来,“议论”已成为人兽的界限,不只在政治生活中以议论参政,在读书等日常生活中也须以议论立身。王十朋亦写邵雍好议论时事,即被人视为“远大未易量”^⑦,足见议论之风流行。与此同时,宋人常以议论作为仕进之途,如曾巩在《上范资政书》中表示求志进学须以议论佐助,“愿闻议论之详,而观所以应于万事者无穷”^⑧,苏辙在《上枢密韩

太尉书》中写“见翰林欧阳公,听其议论之宏辩”^⑨,乃知天下文章所聚等。这一现象牵涉着广泛的社会和思想议题,值得深入研究。

二、政治文化中的“议论”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塑造

议论成为一种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,首先要有特定背景下的国家需求,其次是社会与个体、国家与士人之间相对开放的关系,再者是反思意识的加强^⑩。先秦和魏晋是议论文化的两次高潮,此后在唐宋时议论又逐渐兴起,但唐宋之间亦有差别。

中晚唐时期古代社会、政治等领域的变化被视作一次重要转折,其变化迹象之一就表现在议论方面。中晚唐以来,学术、文辞与议论已经并列,柳宗元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中的“今学如退之,辞如退之,好议论如退之”^⑪,凸显出韩愈的议论行为在文化变革中的价值。然而当时社会整体并未形成议论风气,仍是在制度范围内对“议论”价值的一般认识。至北宋时期,新的政治文化秩序开始兴起,而在这一秩序重建的过程中,“议论”行为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北宋议论成风,就政治与思想文化的整体态势来看,北宋政治上救弊的需要与儒学的复兴造就了议论的热情,其中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宋代养士的传统,如宋仁宗自言“朕每进用大臣,未尝不采天下公议所归”^⑫,苏轼《上皇帝书》称:“自建隆以来,未尝罪一言者,纵有薄责,旋即超升,许以风闻,而无官长,风采所系,不问尊卑,言及乘舆,则天子改容,事关廊庙,则宰相待罪。”^⑬对士大夫议论所形成的“公议”的尊重和对士大夫的宽容,使朝廷中形成了议论之风。从制度上看,宋所置翰林学士亦为议论之官,谏官亦以精文章、好议论为职责,有此政声,方得入馆阁,如蔡襄在《谢知制诰表》中所说,“尝好议论而又尘谏署,主知难遇,不敢爱身;众怒虽多,未始回虑”^⑭。官僚建言以奏议论事,而“仁宗常虚心采纳,为之变命令,更废举”^⑮,上下遇合,议论风气由此而成。张端义总结历代政治的特点时称,“周、隋族望,

唐尚制度、文华,本朝尚法令、议论”^③。其中尚法令指宋代政治改革,尚议论则指宋代政治活动中直言敢议的风气,正是对宋代政治文化的高度概括。再者,宋初承唐例,以诗赋取士,至真宗、仁宗以来,“策论”在进士考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^④,王安石改诗赋为“以经义、论、策试士”^⑤,四库馆臣“当时每试必有一论,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”^⑥,论体文遂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,还出现了研究论体文的所谓“论学”^⑦。可以说,科举考试直接带动了北宋文学中的议论之风。

士大夫直言论说行于朝的内在原因不外乎政治关怀^⑧。北宋士大夫将政治关怀融入普遍的现实关注之中,并上升为一种自觉的集体精神追求,又经长期实践而汇聚成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时代精神^⑨,成为共同的思想信仰。安德鲁·海伍德:“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党、政府和宪法等政治体‘倾向模式’(pattern of orientations),并表现为信仰、符号和价值。政治文化不同于公共舆论,它由长期的价值而非对具体政策、问题或人物的反应塑造而成。”^⑩借由这个概念,我们发现,北宋出现的这种集体倾向,渐成为士大夫共同的思想信仰,而标志性符号虽非特有,但大量出现且普遍使用,显示其已被整个士人阶层广泛接受,这个符号就是“议论”一词。新的政治文化出现和成熟的标志是一套新的政治词汇的出现,斯金纳指出:“我认为,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: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,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。”^⑪随着“议论”被整个士人阶层广泛接受,在宋初至神宗间最为兴盛^⑫,它已不仅是一个凝定下来的专门术语,还成为北宋士人体验和介入现实世界的一个范畴和模式。议论之风贯穿于整个北宋士大夫的生命情怀之中,范仲淹《灵乌赋》感慨道:“灵乌灵乌,尔之为禽兮,何不高翔而远翥?何为号呼于人兮,告吉凶而逢怒?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身躯,徒悔焉而亡路。”但仍坚定表示: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!”^⑬以“议论”为标志,这种激昂感愤之言在后世十分稀有,正代表着北宋的文

化强音,构成了时代精神。

北宋时期议论成风,范仲淹、欧阳修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。范仲淹“每感激论天下事,奋不顾身,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,自仲淹倡之”^⑭,欧阳修的政治议论行为也感染了一时士风,如苏轼《六一居士集叙》写道:“自欧阳子出,天下争自濯磨,以通经学古为高,以救时行道为贤,以犯颜纳说为忠。长育成就,至嘉祐末,号称多士。欧阳子之功为多。”^⑮其中,“犯颜纳谏”即为政治议论行为;吴充称欧阳修“居三朝数十年间,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所宗师”^⑯,其中亦包含议论的因素。苏轼《给事中兼侍讲傅尧俞可吏部侍郎》:“士以德望进,则风俗厚而朝廷尊;以经术用,则议论正而名器重。”^⑰可以说,这种情怀在士大夫之中成为一种共识。

议论一旦成风,必是多音并奏,于是便有区别是非之举,即以己为是、以彼为非的情形。欧阳修的《议学状》批评当时风气:“苟欲异众,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,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。”^⑱苏轼《思治论》也指出时有三患,皆视为“游谈聚议”^⑲,矛头直指新政^⑳。这种对立和斗争在北宋政治中最为普遍,盖因政见不一,各持己见。儒家学者和官僚总是表现出道德论视野下的思想统一的愿望,在现实政治中便不自觉地向包含法家理念的行政效率上靠拢,因而对议论持矛盾的态度:一方面表现为对议论之风的普遍认同和高度肯定,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唯己为是的思想上的专制性。仁宗采重“公议”的同时,说“危言诡行,务以惊众取誉,罔上而邀宠”^㉑,就不能简单地视为言不由衷的两面行为,亦可视为言论的复杂与多样,使他难于应对。《宋史·食货上》批评宋臣制定政策时屡议屡变,“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”^㉒,虽然思考的角度不同,但不失为对历史的精要把握。

北宋士大夫的议论风气及其所塑造的时代精神,呈现为元气勃勃、精神饱满的信仰和坚守,使北宋成为士大夫的理想时代。至南宋,这种风气犹存于政治活动之中。参知政事史浩条具弊事,指出政

治活动中的“议论”虽相异,却有药石之功,不可轻慢,是国家隆盛的根本^⑤。理学思想对人格的塑造也影响深远,如张寿镛在《宋季忠义录序》中写道,宋代困亡于异族,但其风议天下的时代精神却成为士大夫心灵世界的坚实根基,“当时朝野之士,以死御侮,矢不臣奴外夷者,皆是也”^⑥,节烈之行为后世所景仰。再如王恽认为,宋室江山自渡江以来延续百年,是“崇尚议论”^⑦的结果。于此可见,在不少人的认识中,宋代士大夫好议论之风是维持政权的法宝,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。

三 议论文章与学术三分

对于宋代议论风行的现象,若拘泥于传统研究模式,分而论之,便难得其要;若要取一个既超越具体事件,又超越个体、群体差异的体系,就只能是隐含在各家的自觉表述中的学术体系。

宋人对学术体系的表述虽有术语和对象的差异,但总体是一致的。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程颐,他曾将今之学者分为文士、讲师、儒学三类^⑧,但限于道学家身份以及对代表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“讲师”一派进行抗争的诉求,程颐的分类方式在后世应和者较少。南宋人回顾北宋学术思想史时,因拉开历史距离而获得了更深广的视域,如陈傅良《温州淹补学田记》中以范仲淹的“名节”、欧阳修的“议论文章”、周敦颐的“学者经术”为学术“三变”^⑨,王应麟亦引述此说^⑩,陈善则以王安石、苏轼、二程为代表疏理宋文“三变”,认为“荆公以经术,东坡以议论,程氏以性理,三者要各自立门户,不相蹈袭”^⑪等,皆表明北宋以来出现的学术新变已得到学术史的认可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们不约而同地以“议论”或“议论文章”为“学术三变”的一个表征^⑫。

在道德、政事、文学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中,欧阳修是较早被公认有“议论”之才的标志性人物,如廖行之《过省谢知举启》中提及欧阳修在主持科试中对“黜险怪”的引领作用,并进一步指出欧阳修的“议论文章”与韩范诸公之“事业”并列,亦影响到苏黄诸人^⑬。苏辙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》里提

及欧阳修“早游侍从,蔚为议论之宗”^⑭,陈善将欧阳修的“议论之宗”解读为“文章议论”^⑮和“学术议论”^⑯两个层面,既高度肯定欧阳修在宋代经史、文学方面的贡献,亦极力赞赏他的高风与道德。继欧阳修之后,苏轼、曾巩在当时也以“议论文章”著称。如王震在《朝奉郎苏轼可守礼部郎中诰》中称赞苏轼“议论文章,卓然名世”^⑰,秦观在《答傅彬老简》中对只以“议论文章”称其师表示不满^⑱,但由此足见“议论文章”之说代表了时人对苏轼的评价。曾巩本人也以“议论文章”为人所称,如刘埙《南丰先生学问》中即称“当是时,独南丰先生、曾文定公议论文章,根据性理”^⑲。

除当世名公外,当时还有一大批人亦以“议论文章”名世,这显示出“议论”已经得到广泛认可。如蔡戡《大父行状》记其祖父蔡伸“及从元祐诸公游,议论文章有家法,不肯追逐时好”^⑳,雷士俊《再答张天民书》称“交游中议论文章求若吾兄未有其敌,得日夜间常见闻教诚以切劘,诚为大幸”^㉑,王珪《安简邵公墓志铭》称邵亢“议论文章,旁皇温雅,一时台阁闻人盖有所不及”^㉒,苏舜钦以“少年能文章议论”(《宋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一二,宋绍定刻本)为权贵注目,借进奏院狱除名等等。这些都表明,“议论文章”在当时是一个公认的术语,不论来自哪个阵营,都会以“议论文章”为人称许。

当“文章议论”“议论文章”中的“议论”成为超越行为的专有词汇,并与文章形成固定搭配时,一个新的学术概念亦由此而产生。“文章议论”在当时所指甚广,广义的“文章议论”可以包括道德、政事、文学,狭义的“文章议论”则专指文学。就言说者的身份而言,则为官僚、文人、学者以文字表达主张,仍是广义的文学;从内容来看,议论也包括学术著述;就文体而言,不仅散文中的经论、政论、史论属于议论,其他散文文体与诗歌也在议论范围之内。由于内容、身份、文体上的交叉,“文章议论”更多是在普泛的意义上得到使用,能将道德、政事、文学三分体系中的子系统联结为一体。

与此同时,在宋人建立的道德、政事、文学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之中,文学处于被道德、政事之学排斥的境地。排斥者主要来自两个阵营:一是政治官僚,如孙升、王觐、杨康国等无党派官僚,态度鲜明地表达着对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等人的“议论文章”或“文学”的反对。孙升说苏轼的“文章学问”用以“讨论古今,润色帝业”尚可,但反对他“辅佐经纶”^⑦,进入执政之列;王觐上疏反对苏轼“预闻政事”^⑧,称苏轼“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。是故见于行事者,多非理义之中,发为文章者,多出法度之外”^⑨;杨康国称苏辙兄弟之文“率务驰骋,好作为纵横捭阖,无安静理致”,“安足为陛下谋王体、断国论,与共缉熙天下之事哉!王安石以文学进,而天下扰扰,此陛下之所知也”^⑩,甚至将文学置于政事的对立面。二是道学一派,如程颐屡次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社会文化现象对文学表示排斥,认为能文者与谈经者都非“知道者”^⑪,“文章则华靡其词,新奇其意,取悦人耳目而已”^⑫,这样一来,反而剥离了文的迷雾,打破了旧有认识模式,使道德之学以独特的面目出现。而苏轼针锋相对,反对“仕者莫不谈王道,述礼乐,皆欲复三代,追尧舜……学者莫不论天人,推性命”^⑬的追求,与欧阳修主张“切于事实”的内在理路一致,即认为人能通过对事物的考察来认识和理解“万物之理”,其出发点与道学完全不同。

尽管遭到排斥,且各家概念内涵不同,但现实语境中的“议论文章”实际上已成为被时人接受的术语。上引秦观的信中对单以文学定义“文章议论”表示不满,认为对苏轼的评价应包括性命自得、器识、文章议论三个方面。这也显示出,在秦观眼中,三者可以并存。这种看法背后有一个关于体系的共识,因此我们不能将宋代的思想运动、政治活动及古文运动拆开看待,亦不能为凸显古文运动而将前二者仅视为背景。宋代思想文化运动是一个整体,文学、文章作为表达的基本功能不可或缺,而“议论文章”是他们共用的术语,是政治文化的载体,得到了广泛认同。议论既存于各家,文章则为议论之载体。那

么,为什么在“政治文化”的统领下,“议论文章”能够成为一个既包括政治也涵括学术的概念,并为道德、政事、文学三分之学所共同认可呢?

学术分裂后的三个主要类型是道德、政事、文章,涵括了儒学思想、社会治理、文学表达,三者的话语权力与学术处境并不一样,若统而论之,则三者构成了一个各家共有的学术体系,道德是根本,政事是实用,文学止于修辞。若分而论之,在这样一个学术体系中,各家学术虽皆以道德为本体,但各家对本体的认识有差异。如包恢《与留通判书》中指出“倚议论倚文字”^⑭,揭示出学者表达必有所倚赖。虽然精神上可以据德依仁,但在表达上却无法不倚赖议论文字。道学一派亦“好议论”,曾因此被称为“议论之学”,再如黄震讲:“本朝道学之盛亦有渐,自范文正已有好议论,如山东有孙明复,徂徕有石守道,湖州有胡安定,到后来遂有周子、程子、张子出,故程子不敢忘此数公。”^⑮朱熹更坦言:“理义大本复明于世,固自周程,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。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,至永叔、原父、孙明复诸公,始自出议论……此是运数将开,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。”^⑯明确以“议论”区别于汉唐的“训诂之学”。

政事与文学则构成了非常紧密的依存关系,二者思维方式不同,看待事物的立场、角度不同。政事须借文学发表言论,文学则以立言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,对当世之务、政治得失发表意见,而宋代政事与文学合而不分的形态、以议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特质均由此展现。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含括礼治、文治、法治三个方面,文治是社会治理的最高目标,而要实现文治,则政事、文学共同造就的政治文化是必要条件。当立言、文辞皆有深刻的思想为支撑,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和历史评价并发挥现实功能时,“议论文章”则为道德、政事、文学这个学术体系所共有,如陈傅良称楼钥“议论文章,风流蕴藉,则未尝不在称首也”^⑰,即用“议论”评量政治人物,加之文学家亦多具有政治身份,常以此身份发表“议论”,二者自然密不可分。

在这个语境下,学术三分体系之所以能够成立,离不开“文章议论”或“议论文章”这个共有术语发挥出的粘合剂作用。文章包含议论,议论需要文章。在这个专有词汇中,道学与文学在各自的表述中并不排斥“议论”,文学与政治亦彼此包含。各家也正是在涵盖了学术的政治文化中既形成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,又形成相互排斥亦相互关联的共有体系。

四、《文章正宗》与宋代议论文章之变

就文体而言,“议论文章”中的“文章”除了指求取功名的时文,还包括古文、诗歌、赋、传奇。如陈文蔚《送徐仁伯之官序》中称进士试“以文章议论取”^⑧,鉴于宋代科举考试的方式,这里所说的“文章议论”乃诗文并包,又可单指诗歌。再如洪咨夔在《豫章外集诗注序》中讲:“我列圣以人文陶天下,学问议论文章之士莫盛于熙、丰、元、绍间,其生也类在神文朝,如诗家曰苏黄,曰黄陈,苏公生于景祐,陈公生于皇祐,而豫章生于庆历,天地清宁,日月正明,稟于气者全也。”^⑨其中“议论文章”同样包括诗歌。宋人之赋亦“往往以文为体”,出现了以议论见长的“文赋”,宋人传奇亦承唐而以“议论”称于世。于此可知,“议论文章”不仅标志着时代精神和学术三分体系的形成,也早已浸润于文学写作之中,各种文体均受其影响,共同塑造宋代文学的新风貌。

刘永济曾谈到,“六经之中,岂少析理之文”^⑩,但在中国早期文本中,《尚书》代表的仪式性话语是训诫性的,《国语》中引证的方式是以权威服人,《墨子》提出了“三表法”和逻辑类推法,至《荀子》议论文方臻于成熟^⑪。六朝以来,人们开始将“议论”纳入文体理论的思考当中,这标志着“议论”已经从行为、实践层面发展到文体层面,最直接的方式是将议论文分体,以便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疏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中按照分类与分体并用的方式梳理先秦以来的论体文,兼及历史时代线索,分为陈政、释经、辨史、论文四大类,议、说、传、注、赞、评、序、引八种文体。分类以论题、内容、功用三个方面对纷繁多变的

论说对象加以归纳,分体是以论说体制的差异为基准。以分类兼分体的双重模式处理文学中的议论分体更为常见,如萧统先分体,再将各体分类,“凡次文之体,各以汇聚,诗赋体既不一,又以类分;类分之中,各以时代相次”^⑫。至此,分类与分体这两种中国古代议论分析的基本模式得到确立。

宋代的选本基本贯彻了分体模式。巩本栋指出,《古文关键》所选论体文多为经论、政论、本论,而《宋文鉴》所选论体不仅有着“鲜明的现实指向和政治效用”,且论体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一^⑬。这表明在时人心目中,奏疏以鲜明的论政色彩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,文体界限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,议论的方式和内容更受到推重。秦观在《韩愈论》中写道:“夫所谓文者,有论理之文,有论事之文,有叙事之文,有托词之文,有成体之文。”^⑭所分五类中,论理与论事同为议论之文,也未以文体为划分标准。这表明,人们对议论的关注和审视已经超越文体而趋向更高的层面。

真德秀将分类的方式发扬光大,欲以此统合各体文章。其《文章正宗·纲目》在刘勰、萧统分类分体并行模式的基础上,将文章分为辞命、议论、叙事、诗赋四类^⑮。这种总分类的方法超越了刘勰和萧统的分类模式,含括了所有文字表达。真德秀编纂《文章正宗》不是出于文学目的,而是更关注现实功用和政治功能,故以功能而非文体为分类依据。后世学者对真德秀的分类方式有所质疑,如吴讷虽肯定这种分类方式能含括一切文辞,但也认为此书“每类之中,众体并出,欲识体制,卒难寻考”^⑯;再如莫如忠《答吕侍郎沃州》说“辞命乃文章之一体,与疏、奏、封事、论、赞、记、序等,分为体裁则可,而与叙事、议论之凡例等,可乎?”^⑰,更关注文章体制的文学立场,未看到真德秀的用意。体制固然重要,但体制之上还有一个由选文主旨引申出来的文类划分问题,这才是关键。与划分文体相比,分体主要关注载体的规范性体制,而真德秀在对长时段的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时,并非不考虑体制。《文章正宗》主旨即《纲领》所

说的“以明义理,切世用为主”,由此就能超越文体、文类划分依据,去表达他更关注的东西——主体所表现的内容、对象及其主要表现方式。真德秀的划分方式极具眼光,也折射出宋代学术和思想文化的背景。

关于议论之文,真德秀有过细致论述,其要义可以归纳为两点:一、强调议论“初无定体”,不论群臣之间,还是师友切磋都有议论的内容和表达;二、各种文体都有议论成分,不论是《春秋内外传》中的“谏争论说”还是汉以来的“书疏封事”,不论是专门“纂述”还是“书记往来”,包括疏、对策、奏、对、封事、论、谏、上书、书、议、表、原、说、读、辨、赞、赠序等各类文体,都统归于议论类目之下。这样议论就不再单指论体,而是指所有文字表达(包括著述与文章),包含文体、超越文体并居于文体之上。四库馆臣评曰:“至宋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,始别出谈理一派,而总集遂判两途。”^⑧指出了这部总集的开创性贡献。在宋人眼中,古文的主体正是这些“议论”性文体,如姚铉《唐文粹》所选“古文”以原、规、书、议、言、语、对、经旨、读、辩、解、说、评为主,并“绝大多数是唐代产生之比较短小的、思辨性强的、有真知灼见的议论性文体”^⑨。真德秀虽然拒绝了姚铉的分类方式,但对文章的总体看法和历史把握却一脉相承,即重视“议论”,并上溯至先秦,从而形成了系统性的历史建构^⑩。

然而,真德秀对“议论”的历史认识有两个盲点:其一,将“圣贤大训”摒除在议论的历史序列之外;其二,未提及先秦两汉以来大量子学著述中的论体。前者在尊经的时代是普遍亦合理的选择,后者则值得深入追究。孙鑛在《与余君房论文书》中写道:“辞命、议论、叙事列为三体,肇自西山氏,此亦前人所未及。”^⑪其所论有两点值得关注:一是说“议论实自宋人始盛”,正是对宋代议论盛行的一个基本肯定;二是就其议论体制来看,宋人承韩愈而新开一调,不同于先秦诸子如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荀子》的体制。总之,他们皆将论体分为两个阶段,一是春秋秦汉之文,一

为中唐宋人之文,二者体制既异,风貌迥别。那么,唐前之调与宋人新创之调区别何在?刘宁指出,先秦以来论体文在思辨与逻辑上有两个特点,一是注重思理逻辑,一是注重历史引证^⑫,重点在于思想表达。而真德秀编辑此书的目的则是“明义理,切世用”,其中“明义理”不仅注重文章内容与功用,且将其视为文章写作的出发点,是思想标准,“切世用”才是目的。这就导致他在选文上注重“谏争论说之辞”与“书疏封事之属”这类与政治功用密切相关的议论文字。因此,真德秀的视野盲区实际上是在适应当时的文学格局。宋代古文是以“世用”为中心的书写活动,这恰与先秦议论既重思理逻辑又重历史引证的特点不同。宋人议论侧重关注现实政治、社会等重大事件,须以义理、事理、道理为出发点进行分析,思理逻辑便不再是重心。

一个选本的成功主要在于两个方面:一是合乎选文的历史情境,展示出历史的概貌;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到的选文主旨,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与认可。宋代独特的历史情境造就了真德秀的视野和关注点,他敏锐地察觉了宋代社会文化中的“议论”现象,并据当时普遍的文章观念进行了历史重现。可以说,真德秀看到“议论”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,而且是群体行为;议论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表征,在现实政治和士大夫群体中凝聚成时代精神;“议论”的表现并非局限于某些论体,而是存在于大量文体之中;“议论”持续在文本书写与社会文化中弥散。而作为“普遍的文章观念”之“议论”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,因为观念性体认将会体现在文章写作中,从而介入文学活动,参与塑造文学形态的历程。

五、议论进入文体与文学变革

王水照先生认为,宋代哲学思维的境界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,而人文精神和知性反省的思辨色彩就是宋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^⑬。然而通过前面的梳理可以发现,议论之风并不单纯源于重义理的“哲学思维”,因为“思辨色彩”的实际表现

方式便是“文章议论”，二者都直接影响着宋人的文学创作。

宋代文学中的议论有几个趋向值得我们注意：一是议论行为的普泛化，二是议论的实用化，三是表现的文学化。这些趋向直接导致文学思考与表现方式的变革，这一变革借助古文运动得以持续兴盛，并对当时及后世产生巨大影响。

北宋以来议论之风盛行，使得士人将议论作为重要的精神追求，也导致了议论行为的普遍化和普泛化，进而直接影响了文学写作。诗文写作中出现的议论化趋向打破了文章体制和界限，是谓破体。所谓以论为记、以文为诗便是这种趋向的产物。当然，这一过程的萌生远早于宋，如刘宁分析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时谈到“这种‘论’的精神，可以渗透在议说、传注、赞评、叙引等众多文体中，所谓‘八名区分，一揆宗论’”，这虽然“反映了议论性文体越来越深地接受‘论’体艺术之影响的现象”，但“并不是‘论’的主流”（《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》，第70页）。至宋代，论体艺术的影响迅速扩大，直接影响了各种文体的写作，并已经趋于主流。

在文章写作方面，以唐宋时期记文的变化为例，从韩愈的“微载议论于中”到柳宗元“议论之辞多矣”，从欧、苏以后“专以有议论为记者”到诸人“专尚议论”（《文章辨体序说》，第41-42页），可谓风气已成。真德秀就指出“记以善叙事为主”，而“后人作记，未免杂以论体”^①。陈师道也说：“退之作记，记其事尔，今之记，乃论也。”^②当时对这一现象的讨论颇多，但“以论为记”确实是宋人记文的共同特征^③。金代王若虚谓后山之论为不然，云：“唐人本短于议论，故每如此议论，虽多何害为记？”^④方苞认为宋人记文至永叔、介甫“别求义理以寓襟抱”^⑤。这两条材料恰好能够揭示“以论为记”的成因，盖其时与唐人相比，宋代社会整体上长于议论，亦由于宋人好求义理，造就了“以论为记”之风。

在诗歌写作方面，宋诗的议论化特征很早就引

起了人们的注意，除严羽的严厉批评之外，又如傅若金在《诗法源流》中说：“唐人以诗为诗，宋人以文为诗。唐诗主于达性情，故与《三百篇》为近；宋人主于议论，故与《三百篇》为远。”^⑥虽有远近之别，但议论为变体，未易以优劣论之。议论之风盛行，自然会在诗歌中留下痕迹。但从理论上讲，唐诗主兴象，宋诗主议论，却也是最为概括性的表述。在诗歌表现中，议论是融意象、情感之感性和思维之理性于一体的表现方式。唐宋诗并无不同，但不可否认宋诗中理性化的表达更为突出，并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追求。如朱熹所说：“欧公文字锋刃利，文字好，议论亦好。尝有诗云‘玉颜自古为身累，肉食何人为国谋！’以诗言之，是第一等好诗！以议论言之，是第一等议论！”^⑦即诗与议论之间并非不可兼具。刘京臣指出：“宋代诗人往往饱读诗书，其自身的理性思辨、哲学造诣与人文修养都有了较大提高，故而发之为文为诗，便多了些议论色彩。”^⑧可见宋人的议论与整体人文素养相始终，亦逐渐沉淀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。

除诗文外，其他各体也都渐染议论色彩，赋、四六、传奇皆如此。不仅欧、苏等于赋中议论，邵雍《洛阳怀古赋》也是一篇“探讨治乱之源的政治论文”^⑨，可以说，赋体创作已突破了旧有的规定和限制。宋四六亦尚议论，如吴子良曾谈到：“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，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，能兼之者欧公耳。”^⑩再如宋传奇，呈现出“篇末垂诫，亦如唐人，而增其严冷，则宋人积习如是”^⑪的状貌，这固然是由于“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，而宋人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”^⑫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宋代传奇中的议论一方面承自唐，另一方面也深受宋人尚议论的风尚影响，议论的趋向已经深入到“俚儒野老”中^⑬。

议论的实用化与儒学的入世品格密切相关，这是古代议论文章的共识，如欧阳修《荐布衣苏洵状》中所说：“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。”^⑭在文章选本

中,实用或曰“有用”,也是一个不断被强调的话题,吕祖谦在《论作文法》中称:“有用文字,议论文字是也。”^⑩楼昉《崇古文诀》也多次强调“此等议论有益于人主”^⑪、“此等议论有益于世”^⑫、“探本之论,后世以为迂缓,古人以为急切”^⑬,并在评陈师道《上林秀州书》时写道:“非特议论好,读其文,气正词严,凛然有自重难进、不可回挠之势。”^⑭当然,这种实用化品格存在于各个时代,不论是政治官僚、理学大儒、文坛领袖还是各层文人,基本都在追求文章的实用化,如阮忠所说,“散文不是在改造文化而是在适应文化”^⑮。但相比之下,宋代文章在追求适应文化、适应时代的同时,也在追求改造文化、改造时代。这种追求奠定了宋代文化的底色,是儒学思想作用下的一次伟大实践,其影响广泛而深远。

文章表现的文学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,在子史分流后更为突出。曾巩《苏明允哀词》评苏洵之文:“少或百字,多或千言,其指事析理,引物托喻,侈能尽之约,远能见之近,大能使之微,小能使之著,烦能不乱,肆能不流。”^⑯正道出了文学化表达出现在议论中的条件,古文多以独立篇章而非多篇联缀的论述体制出现,“指事析理,引物托喻”虽为论体文共同特征,却是在百字千言的有限篇幅内进行,故不得不引物托喻;在具体问题研讨中,以约近微小见出侈远大著,故更注重在论述中使用文学化表现手法,久而久之,文学思维方式的浸入,带来了思想表达的文学化。在宋文的影响下,后世古文亦把议论视作为文最重要的元素,正如苏伯衡《染说》所写:“学士大夫之于文亦然,经之以杼轴,纬之以情思,发之以议论,鼓之以气势,和之以节奏,人人之所同也。”^⑰议论固是文章核心,但须以灵心为杼轴,以情思为纬,辅之以气势、节奏,这些都包含着大量的文学笔法。

关于北宋以来的文学变革,学者已经从多角度做过深入研讨,但有一点似乎说得还不够,即在新型士大夫政治的笼罩下,形成了相对开放自由的政治

文化,这无疑影响了身在其中的文人士大夫,造就了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的议论精神,进而建构出新的学术思想体系,推进话语权向士大夫群体转移。在如此背景下观照,就不能只将宋代文学变革视为一场单纯的文学运动;描述和分析宋代文学变革,也不能仅持文学的角度。而文学中发生的议论化弥散现象也恰好能够证明,“议论文章”正是将思想、精神与学术变化凝定为一个体系的粘合剂,也在勾勒着这场文学变革的轨迹与特征。

注释:

①何诗海称:“在古代文论中,‘叙事’又称‘序事’‘记事’‘纪事’‘记叙’等,本指与抒情、描写、议论等相对而言的一种表达内容和方式。”(《“文章莫难于叙事”说及其文章学意义》,《文学遗产》2018年第1期)

②王充称:“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,诸子传书为文,造论著说为文,上书奏记为文,文德之操为文。立五文在世,皆当贤也。造论著说之文,尤宜劳焉。何则?发胸中之思,论世俗之事,非徒讽古经、续故文也。论发胸臆,文成手中,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。”(黄晖《论衡校释》卷二〇《佚文》,中华书局1990年版,第3册,第867页)桓范《势要论·序作》亦对“著书作论”十分推重(参见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三国文》卷三七,中华书局1958年版,第2册,第1263页)。

③胡大雷《传统文论的魅力、模式与智慧》,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,第163-177页。

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卷三上,中华书局1963年版,第51页。

⑤王先谦撰,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《荀子集解》卷七,中华书局1988年版,上册,第204页。

⑥过常宝《先秦散文研究——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》,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,第357-364页。

⑦《荀子集解》卷一五,下册,第397页。

⑧《荀子集解》卷三,上册,第83页。

⑨《荀子集解》卷一九,下册,第509页。

⑩司马迁撰,裴骃集解,司马贞索隐,张守节正义《史记》卷一二〇《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10册,第3107页。

- ⑪《论衡校释》卷七《道虚》，第2册，第325页。
- ⑫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，第10册，第3265页。
- ⑬范晔撰，李贤等注《后汉书》卷四九《王充列传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6册，第1629页。
- ⑭缪荃孙《撰上仲长统昌言表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三国文》卷三八，第2册，第1265页。
- ⑮常璩撰，任乃强校注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一一《后贤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638页。
- ⑯《论衡校释》卷一三《超奇》，第2册，第606页。
- ⑰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《朱子语类》卷八〇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6册，第2089页。
- ⑱郝经《陵川集》卷一九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北“商务印书馆”1986年版，第1192册，第209页。
- ⑲杨慎《升庵集》卷七五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70册，第750页。
- ⑳《荀子集解》卷一七，下册，第441页。
- ㉑荀悦《前汉纪》卷二一《前汉孝元皇帝纪》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，第91册，第5a叶。
- ㉒韩愈著，方世举编年笺注，郝润华、丁俊丽整理《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》卷一一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下册，第633页。
- ㉓白居易著，谢思炜校注《白居易文集校注》卷二一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3册，第1218页。
- ㉔杜荀鹤《杜荀鹤文集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63页。
- ㉕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五《公孙述刘二牧志》，第329页。
- ㉖《史记》卷四六《田敬仲完世家》，第6册，第1895页。
- ㉗王先慎撰，锺哲点校《韩非子集解》卷二《八奸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55页。
- ㉘《后汉书》卷二四《马援列传》，第3册，第844页。
- ㉙王十朋《梅溪集》后集卷二六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151册，第583页。
- ㉚曾巩撰，陈杏珍、晁继周点校《曾巩集》卷一五《上范资政书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上册，第243-244页。
- ㉛苏辙著，陈宏天、高秀芳点校《苏辙集》卷二二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2册，第381页。
- ㉜刘宁指出：“‘论’的折衷群言，说明‘论’是一种反思性的文体，因此，‘论’的出现应该和反思群言的时代氛围有联系。”（《“论”体文与中国思想的阐述形式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

2010年第1期）刘文主要在“论体文”范围内进行讨论，本文则讨论普遍意义上的议论。

③柳宗元撰，尹占华、韩文奇校注《柳宗元集校注》卷三一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6册，第2026-2027页。

④李焘撰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、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七六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7册，第4264页。

⑤苏轼撰，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《苏轼文集》卷二五《上神宗皇帝书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册，第740页。

⑥蔡襄《莆阳居士蔡公文集》卷一六，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86册，第137页。

⑦《曾巩集》卷一二《范贯之奏议集序》，上册，第200页。

⑧张端义撰，许沛藻、刘宇整理《贵耳集》卷中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《全宋笔记》第六编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0册，第329页。

⑨孙立尧《宋代史论研究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60页。

⑩倪士毅《作义要诀·自序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482册，第372页。

⑪永瑆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七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下册，第1702页。关于此问题，参见巩本栋《“论家之正体”——宋代经论初探》（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20年第3期）、聂崇歧《宋代制举考略》（《宋史丛考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）及祝尚书《宋代制科制度考论》（《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》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）。

⑫吴承学《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9年第2期。文中多举例证，可参看。

⑬谢琰称：“政治关怀的对象，广义上来说可包括政治（狭义）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道德、宗教等各方面……一切影响到权力世界并得到精英足够关注的事务，都可以纳入政治关怀的范围。”（《北宋前期诗歌转型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309页）

⑭黑格尔著，贺麟、王太庆译《哲学史演讲录》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，第1卷，第56页。

⑮安德鲁·海伍德著，张立鹏译《政治学的思维方式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144页。

⑯斯金纳著，奚瑞森、亚方译《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》“前言”，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，上卷，第2页。

④方诚峰称：“哲宗朝之前，是北宋议论最盛、文字最盛之时。”（《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39页）

④⑤范仲淹撰，薛正兴点校《范仲淹集·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一，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10页。

④⑥《宋史》卷三一四《范仲淹列传》，第29册，第10268页。

⑤⑦《苏轼文集》卷一〇，第1册，第316页。

⑤⑧欧阳修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附录卷一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第921册，第12a叶。

⑤⑨《苏轼文集》卷三八，第3册，第1063页。

⑤⑩欧阳修著，李逸安点校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一〇《议学状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4册，第1673页。

⑤⑪《苏轼文集》卷四，第1册，第118页。

⑤⑫《苏轼文集》卷四，第1册，第116页。

⑤⑬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九，第8册，第4637页。

⑤⑭《宋史》卷一七三《食货志》，第13册，第4157页。

⑤⑮史浩《鄮峰真隐漫录》卷八《回奏令条具时务札子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141册，第595页。

⑤⑯万斯同《宋季忠义录》卷首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28册，第325页。

⑥⑰王恽著，杨亮、锤彦飞点校《王恽全集汇校》卷八九《论科举事宜状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9册，第3656页。

⑥⑱程颢、程颐著，王孝鱼点校《二程集·遗书》卷六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上册，第95页。

⑥⑲陈傅良《止斋先生文集》卷三九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第104册，第920页。

⑥⑳王应麟撰，栾保群、田松青校点《困学纪闻》卷一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11页。

⑥㉑陈善撰，查清华整理《扞虱新话》卷五“唐宋文章皆三变末流不免有弊”条，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279页。

⑥㉒参见拙文《论明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裂》（《求是学刊》2014年第3期）、《学术三分与唐宋以来新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》（《社会科学家》2015年第12期）。

⑥㉓廖行之《省斋集》卷八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167册，第380页。

⑥㉔《苏辙集》卷五〇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》，第2册，第859页。

⑥㉕《扞虱新话》卷三“苏黄看佛书”条，第269页。

⑥㉖《扞虱新话》卷一“欧阳公信经废传”条，第246页。

⑦⑰贺复徵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二一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402册，第118页。

⑦⑱秦观撰，徐培均笺注《淮海集笺注》卷三〇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，中册，第981页。

⑦⑲刘埙《隐居通议》卷一四《文章二》，《丛书集成新编》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，第8册，第147页。

⑦㉑蔡戡《定斋集》卷一四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157册，第715页。

⑦㉒雷士俊《艾陵文钞》卷一〇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35册，第331页。

⑦㉓王珪《华阳集》卷五九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093册，第440页。

⑦㉔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八八，第16册，第9444页。

⑦㉕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〇五，第16册，第9867页。

⑦㉖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〇八，第16册，第9923页。

⑦㉗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五五，第17册，第10908-10909页。

⑦㉘《二程集·遗书》卷六，上册，第95页。

⑦㉙《二程集·文集》卷八，上册，第580页。

⑦㉚《苏轼文集》卷四八《应制举上两制书》，第4册，第1392页。

⑦㉛包恢《敝帚稿略》卷二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178册，第721页。

⑦㉜黄震《黄氏日钞》卷三八“本朝诸儒理学书”条，元后至元三年（1337）刻本，第8a叶。

⑦㉝《朱子语类》卷八〇，第6册，第2089页。

⑦㉞陈傅良《止斋先生文集》卷一三《朝请大夫起居郎兼玉牒所检讨官兼权中书舍人楼钥除中书舍人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第104册，第788页。

⑦㉟陈文蔚《克斋集》卷九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171册，第70页。

⑦㊱洪咨夔《平斋文集》卷一〇，《四部丛刊续编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，第424册，第4a叶。

⑦㊲刘永济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61页。

⑦㊳《先秦散文研究——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》，第360-361页。

⑦㊴萧统编，李善注《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册，第3页。

⑦㊵巩本栋《南宋古文选本的编纂及其文体学意义——以

〈古文关键〉〈崇古文诀〉〈文章正宗〉为中心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9年第6期。

⑨③《淮海集笺注》卷二二，中册，第751页。

⑨④真德秀《文章正宗·文章正宗纲目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355册，第5页。

⑨⑤《文章辨体凡例》，吴讷著，于北山校点《文章辨体序说》（与徐师曾著，罗根泽校点《文体明辨序说》合刊）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，第9页。

⑨⑥莫如忠《崇兰馆集》卷一五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二辑，黄山书社2016年版，第82册，第264页。

⑨⑦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六，下册，第1685页。古人多以真德秀为理学中人，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。长期以来，将《文章正宗》与理学直接联系起来，甚至视为理学在文学领域之代言的看法是不准确的。许浩然《从词臣背景看真德秀与理学的关系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16年第5期）有专门论述。编者的学术思想不能直接与编纂实践中的指导思想等同，更不能与选文实践完全等同，如从真德秀“议论”类选文看，他所关注的绝不只是理学的“理”，而是包括了义理、治道、褒贬在内的广义之理，兼含义理与事理。当然，这个看法尚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可，笔者或将以专文讨论，以求教于学界诸贤。

⑨⑧吴承学《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9年第2期。

⑨⑨当世与其认识接近的是陈骥，《文则》以功能划分文类，分为载事之文、载言之文、析理之文。后世承其意者如章学诚《和州文征》分奏议、征述、论著、诗赋四大类，曾国藩《经史百家杂钞》分著述、告语、记载三门（参见何诗海《“文章莫难于叙事”说及其文章学意义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8年第1期）。

⑩⑩孙鑑《月峰先生居业次编》卷三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，集部第126册，第199页。

⑩⑪刘宁《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7页。

⑩⑫王水照《宋代文学通论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3页。

⑩⑬王应麟著，张骁飞点校《词学指南》卷四，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493页。

⑩⑭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，《历代诗话》，上册，第309页。

⑩⑮谷曙光《“以论为记”与宋代古文革新发微》，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1期。

⑩⑯王若虚著，胡传志、李定乾校注《溇南遗老集校注》，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00页。

⑩⑰方苞著，刘季高校点《方苞集》卷六《答程夔州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上册，第166页。

⑩⑱文师华《金元诗学理论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，第204页。

⑩⑲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九，第8册，第3308页。

⑩⑳刘京臣《晁说之诗歌“好议论”论略》，《济宁学院学报》2012年第1期。

㉑刘培《说理与感悟——论北宋文赋的两种走向》，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2期。

㉒吴子良《荆溪林下偶谈》卷二“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”条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481册，第498页。

㉓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，第96页。

㉔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二九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283页。

㉕时娜《试论宋传奇的“文备众体”》，《理论界》2013年第3期。

㉖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一二《荐布衣苏洵状》，第4册，第1698页。

㉗吕祖谦《古文关键·看古文法》，黄灵庚、吴战垒主编《吕祖谦全集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1册，第3页。

㉘苏辙《臣事一》评语，楼昉《崇古文诀》卷二六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354册，第210页。

㉙曾巩《书魏郑公传后》评语，《崇古文诀》卷二七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354册，第222页。

㉚程颐《论经筵第二札子》评语，《崇古文诀》卷二六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354册，第212页。

㉛陈师道《上林秀州书》评语，《崇古文诀》卷三一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354册，第249页。

㉜阮忠《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嬗变》，《河南大学学报》2000年第2期。

㉝《曾巩集》卷四一，下册，第560页。

㉞苏伯衡《苏平仲集》卷三，《丛书集成新编》，第67册，第486页。